

如花如瓷,爱兀自绽放

——胡辛小说创作论

胡颖峰

—

我愿意从胡辛 28 年前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开始,去探寻胡辛小说创作的发展。一个作家创作的发展,应该是在艺术的国度里不断淬炼自我、磨难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因而无论在“人格”还是“风格”方面,都具备文学史的“典型”意义。《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写的是昔日中学同窗的四个普通女人在阔别二十年后邂逅,各自对逝去岁月的诉说。那是一段青春盛放的岁月,“理想的火苗”在她们的胸中燃得旺旺的;进了文艺学校的叶芸想成为“小潘凤霞”,高中辍学进了抚河棉纺厂做挡车工的蔡淑华要做“小郝建秀”,进了助产学校的魏玲玲欲争当“第二个林巧稚”,而考上北师大的柳青,她的理想则是成为“乡村女教师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然而,那也是一段青春残酷的岁月,生活是那么含辛茹苦:蔡淑华工作后不久即离开织布机成了一名区妇联干部,她喜欢自己的工作,但丈夫对她的工作不屑一顾,只希望她做好子女的姆妈,而子女们对她这个家务事全包的姆妈也总是抱怨。叶芸分到县剧团当演员,她靠自己的努力成了剧团的二牌花旦,却不得不为了结婚生女而中止,当她拒绝再生育、做了结扎重新活跃在舞台上,却遭到好事者的恶意中伤诽谤,此后她两次离婚,直落得身败名裂,身心交瘁。魏玲玲分到县医院干了六年接生工作后,被剥夺了助产士的权利,下放到偏僻、闭塞、穷困的乡村,但成家后为了丈夫的冷暖营养和当好儿子的“家庭教师”,她改了行,没有事业的依傍使她心中充满落寞、忧怨之情。

在作者笔下,蔡淑华、叶芸和魏玲玲的人生充满了理想不得实现的辛酸和痛苦,人们由

此了解到:压着因袭重担,身处各种条件尚且十分落后匮乏的社会环境里,女性带点强制性地走出家庭之后,她们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所面对的苦恼、阻碍何其深重,她们承受着比任何一个时代的妇女都更为沉重的负荷。但即便如此,胡辛仍执着于“理想”,柳青便是她塑造的一位“理想”女性:她一生未婚,默默无闻地在农村执教十五年,虽然在山野不正规的学校里没有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但她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了人世间最崇高、最纯真的爱”,不幸的是她已身患绝症,面对死亡。阔别二十年的经历,行年四十的感慨,四个女人在事业、理想、爱情、婚姻、家庭中的寻寻觅觅,负重若轻地浓缩在这个短篇中。“理想”与“爱”显然即是胡辛的内心“世界”。

这篇小说,体现了新时期之初女性写作的新质,即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和“社会人”的价值,代表了女性现代意识即女性的自主自觉意识的诞生,呼应了时代人性觉醒的普遍要求,这部作品应该是那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文学”作品之一。

—

胡辛从《四个四十岁女人》的“理想”情绪里走出来的标志是《蔷薇雨》。波娃认为:“(妇女)要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属于自己之后,更要书写自己。把自己从父权制的定位身份挣脱开来,写内在的自己,写真正的自己,写希望的自己,如此才能让女性的声音被听见,那长久而深藏的压抑才能纾解。《蔷薇雨》集中展露了女性内在爱欲的自然性。出身书香名门的徐家七姊妹,尽管生活经历不同,个性脾气各异,但对爱的追求都是那么执

着。主人公徐希玮清高孤傲,经历生活磨难却仍然虔诚地寻找真爱。她的大姐希璞在静默如死水般的现实爱的不满中处处透出对理想爱的渴求,二姐希玫从无爱的婚姻中挣脱出来却又陷入荒谬的情爱之中。在更为年轻的一代女性身上,对爱的追求表现得更为大胆而热烈。四妹希瑶爱上了个“流浪无产者”,五妹希均做了垃圾老头的媳妇,六妹希玑相好上一位个体户,青春活泼的七妹七巧则追求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浪子凌云。在作者笔下,女性的爱欲仍旧负担着太多社会的沉积物,但名节、操守、门第等传统观念,咒骂、凌辱乃至磨难,都改变不了女性对爱的初衷。我们在《蔷薇雨》看到,女性在投身爱情的时候,常常带有赴汤蹈火式的勇敢,既可超越世俗的礼法,又蔑视现实的差距,甚至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虽然外在的形式极端对立,但内在的真诚是一致的。小说中女性叛逆的声音无疑昭示着她们爱欲本能的解放,有着反抗父权体制对女性爱欲长久以来的误解与压抑的作用,更是女人身体自主权的一种争取。

胡辛以为,女人的陶醉多在母性,女人的痛苦多在爱情。《蔷薇雨》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写出了女性在爱欲中的局限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可奈何的伤痛感。主人公希玮当年被初恋凌云离弃,怀着凌云的骨肉离开家,在先天下肢瘫痪的儿子死了之后又回到家,她想报复男人但奈何不了,在委身于辜述之这个软弱的半男子之后,又猝不及防地被他“骗了、玩了、甩了、扔了”,再次在爱情上遭到毁灭性的挫折,她不由反省:“为什么青春逝去、历尽磨难之后,她会重蹈覆辙,又一次栽进感情的陷阱,让千疮百孔的身心又一次新添累累伤痕呢?不要去责怪男人,怨恨的只是自身。”女人永恒的弱点铸就了她永恒的悲哀。

《蔷薇雨》的独特之处在于为女性安排的是自我救赎之路。作者让希玮十八年来独自一人咀嚼伤痛,这是个“残酷”的安排,凌云最后是作为对她的补偿和完成而来到她身边的。而希玮的姐妹们最后纷纷离开家,亦可看做是女性集体无意识的“逃脱”。作者借七巧之口说出:徐家姐妹离开家,“不是因为家太肮脏,而是太清白!清白得容忍不了一点污垢一点尘埃,这种清白便成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在我们本来就够弯的脊梁上又平添了重量。所以,我要离开这个家!”在这里,女性的出走是自我追寻,是追求更真实、更自由、更尽情的一种自我。

在表现情爱的文学作品中,重要的是人,是人的感情,是感情的情态与意境,而不是故

事情节的始末,这也许是区分优秀作品与平庸之作的一个标志。胡辛很懂得这点,她的作品与好些着力于写故事情节的情爱作品不同,她主要致力于写一定情况、一定情势下的人,人的感情,以及感情的意境与情态,而这一切均在四季的雨与女性生命悸动的微妙互动中。作者笔下没有为爱殉情的悲剧,而总是让她的人物经得起伤痛事件的打击,但,人虽未死,伤痛却在身上隐隐可感,长年累月不消,甚至会伴随此后的余生,这就构成了她作品中哀伤惆怅的基调。从《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到《蔷薇雨》,胡辛女性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它完成了从女性理想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演进到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

三

在《蔷薇雨》中,女性自然之爱欲的觉醒如春日之花,她们以出走表达对传统道德命名的男权中心的叛离,可中心仍稳如泰山。根据女性主义学者肖瓦特的说法,要真正达到“她们自己的文学”,女作家在质疑、批判甚至颠覆既有体系之后,必须反省自省,进而重构己身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胡辛的长篇《怀念瓷香》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从情节上看,这部小说主要写了一个缠绵悱恻的情爱故事,其中夹杂着扑朔迷离的家族谜、古瓷案。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讲,以此为情节基础多少显得平常,这显然不是胡辛这位勤于思考、勇于追问的作家所追求的。事实上,在《怀念瓷香》中,故事情节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作者并不在意小说的故事本身,她无意于把故事讲得多么扣人心弦、引人入胜,胡辛所在意与她所力求达到的是什么呢?是超乎这一个情与爱的故事之上的带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东西,是对故事背后历史和文化中女性匮乏与空白的关注。

在小说中,陶瓷的历史基本上是由男性来讲述的:林陶瓦向树青讲述皇瓷和皇瓷镇的历史,毕一鸣向苔丝讲述渣胎碗和民间青花的历史,古陶瓷博览区的老师傅讲述皇瓷镇的瓷器工艺——过手七十二……,但当男性很自豪地讲述陶瓷的辉煌历史时,作者却掀开这些历史的表象,让人同时看到女性在陶瓷史中的创造:“皇瓷镇的女人在炼瓷史上一直是巧手辈出,功不可没的。只是男人的历史埋没了她们而已,所谓高岭婆婆的传说、孝女跳窑出祭红的传说、青花仙女的传说等等,可看作一部隐形的妇女陶瓷史”、“最早的陶就是陶的雕塑,是由女人发明的。”而在皇瓷鼎盛时期,郑贵妃与青龙缸、徐皇后与永乐瓷、张太后与蟋蟀瓷

罐的故事也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更不用说当代以凤雕著称于世的占家女子心灵手巧,芳名远扬,当年传经送宝就是由占家媳妇赛桂英担纲的;树青的养母江玉洁,一生钟情粉彩,长相丑却冰清玉洁。而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主人公树青四十来到白色荒原,参加皇瓷镇专题片的拍摄,这一部现代的陶瓷纪录片恰恰是由树青这位女性执笔的。虽然最后没有署名,没有得到她应该得到的名和利,但撰稿书写本身便是一种再命名、再呈现、再诠释,便是一种拒绝被遗忘;或更进一步说,女性要争回历史发言权,就必须坚持书写,并且扩大书写。由此,胡辛在《怀念瓷香》中开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陶瓷世界,并且这个世界是由女性赋予的生命所占有。这使她的女性视野,陡然开朗。

她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创造中的女性力量,那在生命开始的血缘相系的“母性空间”,便成为小说最具革命性的寓言。《怀念瓷香》中的主人公树青是个遗腹子,她没有父亲,在没有男人的家庭中长大。“家里并无婚姻的痕迹,也无男人的气息”。而“母亲是一个伟大又庄严的书面语”。树青和母亲、外婆,以母女世代的互慰方式(感情的力量)取代父子传统冲突典型(权力斗争),深具反思意义。其实母女同流的女性力量集结,足以汇聚成一片女性生命的海洋。小说中另一个无父无母的女性江红莓,她回乡寻根,便是寻找母亲的过程,由此与骚寡妇、养母江玉洁、传说中的大小姐和苔丝,汇成了另一道母性的生命之流。胡辛试图开拓一道河渠,沟通母女之间的生命之流,因为她们本是同源。母女共生共创,更能互爱。

因此,《怀念瓷香》是一部超越故事情节现实的作品,表现出“女性主义探索”的独特所在。作者用书写来颠覆现状,并将女性接引到历史的关键处加以重新定位,试图以女性观点渗透历史话语来突显自我。她重新诠释了历史中的女人,其实也在重新移转女人自我的地位。这对于女性重新审视自我地位的意义,无疑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女性不再以男性的角度评断自己,已懂得自我肯定,自我照亮。在这个意义上,《怀念瓷香》可以说是胡辛小说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从这里开始,胡辛建立起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小说语汇,一种对重构己身历史的理解。她的小说既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

四

文学同时为境界与语言的探索,作家于表现其心灵体验之际,即是同时寻觅适当的意象、辞藻、章句、布局等以作为表现媒介的过程。“许多伟大的小说,都有一个象征的世界。

象征既是一个外在的具象的世界,也是一个内在的情感和观念的世界。或者准确地说,是一个旨在浑含而诗意地表现人物内心世界和作者的情感态度的形象体系。”胡辛用心于意象经营,是形成其小说风格之要因,这里尝试剖析胡辛小说中最具核心意义的两个象征意象——蔷薇和陶瓷,试图去回溯一段探索情境与语言的美丽途程。

胡辛生于暮春,自言开于暮春时节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她透过蔷薇来自喻自况,虽为咏物,实则感物吟志,而其穷物之情、尽物之能的笔触便呈现在作品《蔷薇雨》中。

她将徐家七姊妹对情爱的追寻比作盛开的野蔷薇:徐家书屋院中,“每每暮春,最火旺的自是蔷薇”;“迎面一墙红蔷薇,花团锦簇,浓艳如瀑”;“开得出奇猛浪娇娆,……惊心动魄得邪乎!”在西方国人中,蔷薇是象征爱情之花,在诗文中以蔷薇写爱情的更是例不胜数。在《蔷薇雨》中,胡辛借着蔷薇的书写,呈现了七姊妹在情爱追求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态:欲爱时的等待与渴望,欲爱时的震颤与悸动,欲爱时的大笑与大哭,欲爱时的眷恋与愤怒,欲爱时像重生与濒死一般的燃烧与撕裂的痛……作者以蔷薇为题抒发其生命的观点,借蔷薇的属性来比拟人生遭遇,以歌咏蔷薇来传达对女人爱欲价值的肯定。

如果说蔷薇意象的运用在文学叙事中已经形成了传统,胡辛以女性的视角对之进行了现代探索;那么陶瓷这个物象在《怀念瓷香》中充满象征意味的存在,在个人艺术独创方面则要走得更远。

在《怀念瓷香》中,瓷器至少可以被读解出两个层面的象征意义:

一个是象征女人真挚高贵的情感。这种情感便是作者感悟最深的炼瓷的过程:卑贱的泥土、清纯的水,经人的热心热手揉成一处后,进到火的恋膛里,“历经 1700℃ 高温的烧炼,什么苦痛没经历过?”、“愈是精美高贵的瓷,愈是害怕碰撞,哪怕轻轻一碰,它也粉粉碎。”小说中树青自少女时代起便萌发对林陶瓦的爱恋,这爱恋便像这炼瓷一般,愈是纯真深挚,愈是害怕破碎;一个是象征女人坚烈自尊的性格。小说借林陶瓦之口说出:“石会崩,木会朽,人会亡,而瓷,即使粉身碎骨,千年万载后其质也不变。瓷是永恒的信息,是不朽的瓷工的史记。它总是忠实地、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时代特有的光辉。”这便是陶瓷惊艳的美丽。小说中的树青便是有着这瓷一样秉性的女人:敢于抗衡,不卑不亢,“碎成一瓣瓣,也依然故我。”她

素手青条上 红妆白日鲜

——地域、女性双重视阈中的胡辛作品研究

何 静

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对作品进行研究是一个虽古老又常新的论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1934年4月19日鲁迅先生在《致陈烟桥》信中明确指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在江西,有这样一位女作家,自1983年以《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荣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来,28年笔耕不辍,涉小说、传记、散文随笔、理论研究等多种形式,又拓展影视疆域,凝聚成800余万字墨香纸质文本、编导17部94集情意脉脉的影像作品。她不仅较早地用小说文体和女性视角审视女性生存状态,而且对生她养她的一方厚土的挚情激情喷薄,“实现了

她曾经许下的真诚的诺言:为这方水土这方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笔墨的录像”,她,就是被评论界称为“红土地的女儿”的胡辛。

在流变中守恒,她与她的作品始终有着特立独行的风姿。其文风清丽婉约中不乏率真英武之气,内容大多聚焦于两座城市和一方乡野,那就是省城南昌、瓷都景德镇和江西苏区。胡辛关乎女人的命运,更将女性的生命体验与地域、历史镶嵌交织。流逝岁月中的女性形象无不打上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和清晰的时代标签。《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彰显出胡辛朦胧的女性意识和古城南昌情结,而一场《蔷薇雨》让满怀的女性意识与乡土情怀这二元视野交错交融色彩缤纷。红土地情结尽现于《我的奶娘》、

对人间男女情感的本质,有着不留情面的透彻,即便红颜老去,爱心依旧,纯真的本质依旧。作者借由瓷器之美来弥补女人现实中的无力处境,也有自我勉励之意。

蔷薇、陶瓷,它们是美丽的自然之物,在小说中经由作者经验的综合、转位和女性视角的暗示,赋予其社会属性,使之情感化、拟人化,从而与女性实际生活的心情感应,与女性生命状态的呈现暗通,并寄予女人的未来许多希望,遂自视觉的单调意象升入感官与性灵的复叠意象,成了最动人的自然之物。它们在作家的艺术自觉下,通过文字的经营,成为一种隐喻,蕴含着作家观看人世的讯息。胡辛面对这些物象,深耕文字的犁耙,开出一方充满诗意的田圃,建构起了由作者和读者共同组成的心灵共同体。她把握着的是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最高意义。

五

胡辛是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江西自现代以来文学成就最突出的

女作家。她由《四个四十岁的女人》发轫,从追求女性为社会承认的“理想”价值,到《蔷薇雨》呼唤女性的内在自觉,再到《怀念瓷香》重构自身历史的母性书写,其小说创作的清晰流变可谓代表了女性写作的三个阶段。她年近四十才开始文学创作,纵横文坛近三十年,凝注其热血,坚忍其意志,勤勤恳恳,以笔为锄,持续耕耘,为自身、为女性、为人世,耕耘一片丰畴沃野——既无愧于文学的庄严,亦无愧于艺术的崇高,实为人格与风格之合一。她的小说见证了一个学者型作家艺术创造的品质和智慧,使人们看到:一方水土和一方女人有着隐秘的生命关联,一种具有持久魅力的写作,往往是经由自身丰富的生命感悟而朝向地域与传统的一次精神扎根。她的小说既淡也浓,时而端庄如成年者,忽而又纯真简单如孩童,行年四十如柳青、如徐希玮、如树青,理性、知性、独立、强韧、热情而敏感、倔强而脆弱,她们总是走在返乡的途中,寻找自己的历史、自己的“自我”,而那亘古的爱呵,是她不变的信仰,即令必然如花如瓷,也依旧会兀自绽放的……